



## 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移民治理

冯永利 王明进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欧洲的外国移民大量增加,形成了不同文化族群在欧洲共存的状态,也为移民的治理带来了难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相继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声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平等共存,但其实施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造成文化区隔,刺激了欧洲极端排外势力的增长,并导致了少数族裔长期居于弱势地位,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引发社会骚乱的一大根源。

〔关键词〕 欧洲;移民政策;多元文化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3)03-0032-37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洲主要国家治理移民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与外来移民有关的骚乱和暴力恐怖活动在欧洲的不断出现,却显示出欧洲在移民治理方面出现了某种偏差。2005 年 7 月伦敦“七七爆炸案”、2005 年 10 月巴黎骚乱以及 2011 年 8 月的伦敦骚乱等,都与外来移民有关,表明了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欧洲当地居民的排外情绪也在增长,特别是 2011 年 7 月 22 日挪威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制造的有 77 人死亡的爆炸枪击案,凸显了欧洲右翼排外势力的猖狂和危险。这些事件都说明欧洲各国当前面临严重的文化冲突和移民治理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欧洲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执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 移民情势变化与欧洲移民治理政策演变

就欧洲而言,并不是由所有的移民都会带来因文化因素而产生的移民治理难题。欧洲内部的移民,特别是申根协定之后而出现的欧盟内部的人口迁移,以及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中东欧及南欧国家向西欧国家的人口流动,由于都属于欧洲范围之内的人口迁移,文

化上的亲缘关系使这些移民并没有带来治理上的太大难题。真正被认为是所谓的“问题移民”的,是来自以前殖民地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sup>〔1〕</sup>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来到欧洲,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使欧洲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巨大的文化差异产生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推动着欧洲的移民治理政策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战后重建的需要,大量来自亚非拉地区的人口涌入欧洲,形成了一次次移民高潮,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和文化景观。20 世纪 50—60 年代,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导致原欧洲殖民地人口大量进入欧洲。进入法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其在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进入英国的外来移民则来自于其遍及全球的广泛殖民地,包括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和非洲国家;荷兰的外来移民则主要来自加勒比地区以及摩洛哥和土耳其;北欧诸国的外来移民则来自伊拉克、伊朗、索马里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地。60—70 年代,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促使其向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移民主要是穆斯林移民敞开了大门,导致了大批移民的进入。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从曾经为其殖民地的约

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招募了大批劳工,而德国、瑞士等国则从土耳其招来大批打工者。

在80年代之前,欧洲各国主要是从同化的角度来处理外来移民的问题。英国是以处理种族关系的方式来处理移民问题的,这里的种族特指“有色人种”,其基本原则是针对个人而非群体,只提机会均等,反对种族歧视,而没有出台积极的政策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英国内务大臣在宣布《1968年种族关系法案》时表示,这个法案是为全体国民的,而不是只为少数群体的。<sup>[2]</sup>法国处理移民问题的办法是忽视多民族社会现实的“嵌入”式政策,要求移民“同化或者离开”,移民必须融入居住国的文化,不得组建移民社团。德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把移民当作“客籍工人”,并没有设想让他们长久地居住下来,而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一定时间之后回到母国。

但是,进入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外来移民作为多样性文化群体存在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首先,二战之后进入欧洲的移民已经开始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这些移民实际已经成为常住人口,这些人有的已经入籍,但很多人仍然是外籍人口,这些长期居住在异国的外籍人已经具备了参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条件。其次,80年代后,欧洲一些国家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实行家庭团聚政策,越来越多外国移民的家庭成员,依据家庭团聚政策纷纷来到欧洲。最后,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移民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把发达的欧洲作为移民目的地,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移民把欧洲作为他们定居的目的地。另外,中东和平进程的停顿、伊拉克战争以及近年来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也导致中东和非洲国家地区的人口向欧洲移民的新浪潮,这些移民的目的就是在欧洲生存下来。由于文化上的近亲性和经济条件限制,这些移民通常扎堆居住在租金廉价的城区,或者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而文化上的隔膜促使当地人纷纷迁出,从而形成移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

这些聚居区里的移民一般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特别是对于外来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来说,他们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但仍然有一些社会政治因素使他们未能全面参与诸如住房修建规划、城市复兴计划、教育保障以及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公共事务”,<sup>[3]</sup>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愤怒。这时移民的心态已经与他们的先辈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隐忍,他们接受了西

方的自由平等教育,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日益不满,从而使移民与政府、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不断出现,移民的治理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前治理外来移民的政策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而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实践,为欧洲各国政府从文化角度治理移民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 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在欧洲的遭遇

多元文化概念产生于美国,这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需要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在多元文化概念产生之前,“熔炉论”大为流行。1845年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自己的私人笔记中明确以“熔炉”描绘他联想中的美国,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白人和非白人,都将在美国大陆融为一体,形成“美国人”。1908年美国犹太裔作家赞格维尔(Israel Zangwill)创作了戏剧“熔炉”,作者借剧中主人公之口宣称:“美国是上帝的熔炉,伟大的熔炉,所有来自欧洲的不同种族都将在这个熔炉中熔炼重生!”“熔炉论”因而在美国广泛流行,并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肯定,成为20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移民治理政策的主导。<sup>[4]</sup>但正统的“熔炉论”认为能够熔炼成为新美国人的只有欧洲信仰新教的白人(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 WASP),其他有色人种包括来自拉丁美洲的西裔移民都是不可融合的族群,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多元文化主义是在批评“熔炉论”基础上产生的。1915年美国犹太裔哲学家卡伦(Horace Kallen)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认为文化差异与民族自尊是相辅相成的,保持民族多样性,尊重种族和民族差异,只会更有利于美国国家的巩固。美国应该成为各民族文化的联邦。1924年卡伦出版《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一书,正式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概念,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世人的关注,特别是60年代以后,欧美民权运动蓬勃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由书斋走向社会治理的现实。尽管对多元文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从那以后,弱势族群开始以多元文化之名维护本族的权益,优势族群也开始以多元文化的名义制定政策,尊重或礼让弱势族群的

权益。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率先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而 80 年代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将多元文化主义应用于移民治理,例如法国提出了“融合与同化”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英国提出了“互相宽容、互不干扰”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荷兰则提出了“绝对宽容”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也有些国家虽然从来不提多元文化主义,但也实施了一些具有多元文化主义意涵的文化自治政策,例如德国。

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社会所有民族和文化群体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协同合作,遵循以文化多样性为特征,以种族平等、自由、共存为理想,以各民族个体和群体共同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多元文化主义国家为治国纲领。经过多年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被赋予了越来越宽泛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承认公民可以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2)政府支持报刊、电视、电台使用各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3)支持少数民族为本民族的节假日举行特别庆典;(4)允许在学校、军队以及日常生活中穿着传统和宗教服装;(5)支持少数民族音乐艺术发展;(6)制定专门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在政治、科技、教育等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代表;(7)允许少数民族在本族群内部适用特殊条规。<sup>[5]</sup> 欧洲各国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包括允许使用少数族裔语言的媒体存在,支持他们的民族节日和庆典活动,允许建立宗教活动场所,甚至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支持少数族裔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各类活动以及为移民子女开办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专门学校等。多元文化主义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但其实践并不如其理论上描绘的那样美妙。

各国政府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时候各取所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缺陷。英国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主要针对英国的广大非洲殖民地,认为非洲社会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特性,即文化的相对性,应该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该理论成了英国对广大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制度”的理论基础。<sup>[6]</sup> 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上就体现为地方政府采取比中央更为宽松的政策,允许少数族裔文化自治,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不干涉文化的方式,<sup>[7]</sup> 这就是英国所谓的“互相宽容,互不干扰”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法国在 1981 年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之后,在移民

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允许外来移民组织各种文化和宗教协会,实际上承认了多元文化的存在。但是,法国政府却不愿意出台明确承认少数民族的政策,1991 年发表的《关于融合建议》给出的解释是,法国并不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但是认为承认少数民族则暗含着某种歧视性态度,并认为传统的平等原则、承认个人权利以及非歧视性原则能够更好地保证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机会。<sup>[8]</sup> 到 90 年代,法国的移民政策再次收紧,多元文化政策在很多方面流于表面。例如多元文化政策中的“语言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为了便于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迁回到自己的祖国。<sup>[9]</sup> 这是法国所谓的“融合与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德国的例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欧洲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方面的局限性。德国到 60 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移民的治理问题,但其强调的不是“融合或者回迁”,而是“暂时的融合然后回迁”,在欧洲其他国家开始探索用多元文化政策治理移民问题的时候,德国却在 1983 年出台了《促使外来工人回迁法》。德国政府很少提“多元文化主义”概念,而仅仅强调改善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只是基于移民回迁的目的,才使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文化自治的权利。到 1989 年德国才在法兰克福设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处”,但其在改善移民的处境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实施一直遭遇着强大的阻力,各国政府在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时候往往谨小慎微。尽管欧洲不少国家政治精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倡导多元文化政策,但社会中下层民众所认可的多元文化仅仅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这种多元文化共同构成了欧洲文化,这种欧洲文化来源于三种传统:基督教、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文化被各种不同的独立的欧洲民族所共享,具有超越其他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而欧洲之外的宗教和文化往往被视为外来文化。<sup>[10]</sup> 2006 年,英国女记者梅勒尼·菲利普所著的《伦敦斯坦》一书充分表明了一些英国民众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看法。该书指出,英国政府“固执得近乎愚蠢地奉守文化多元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结果导致伦敦沦为恐怖主义的国际神经中枢,”<sup>[11]</sup> 成了作者所说的“伦敦斯坦”。在法国,80 年代中期兴起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认为外来移民无法接受法国的价值观念,接受多元文化是危害法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德语中,“多元文化”一词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消极涵义,因为德语中“文化”是一种具有纯洁性的东西,某种只能从一个国家的精神中被发觉的东西,从根本上排斥

了外国人的参与,多元文化是对文化的一种损害。由“欧洲”和“阿拉伯”两词合成的“欧拉伯”一词在欧洲的流行就反映了欧洲一些人的心态。<sup>[12]</sup>“欧拉伯”论的事实依据便是穆斯林移民不仅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而且欧洲新出生的人口中有一半是穆斯林。欧拉伯论者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助长了伊斯兰政治观、价值观在欧洲的全面传播,威胁并玷污欧洲文明,最终导致欧洲的伊斯兰化。

即便如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实施对改善外来移民的生活环境和地位,促进他们的文化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下允许穆斯林兴建伊斯兰清真寺,在移民祖籍国的大力支持下,以前在欧洲城市很少见到的清真寺开始大量涌现,成为欧洲各大城市一道新的景观。有数据显示,1961年,西欧的清真寺总数为382座,其中有350座位于历史上与阿拉伯世界有密切联系的希腊的色雷斯和罗德岛等地,西欧其他国家的清真寺极少。但是,在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到1995年的时候达到了6000座。<sup>[13]</sup>在不少国家,少数族裔可以拥有自己的学校和文化设施,可以庆祝自己的节日,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使外来族群很好地融入欧洲,反而造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区隔,移民难以融入当地族群以及社会排斥的不断增加,固化了外来文化群体的弱势地位。对于移民及他们的后代,欧洲各国虽然依靠资金投入养着他们,但却没有赋予他们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认同,使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一个被日益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成为欧洲社会中的“孤岛”。例如在教育方面,移民群体无法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欧洲国家鼓励移民开办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专门学校,但教学质量不能保证,例如德国甚至鼓励移民祖籍国管理移民的教育事务,使移民虽然身处德国,接受的却是祖籍国的国民教育,这就使移民的子女难以在欧洲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这些移民的后代就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这些移民的聚居区成为当地的贫民窟,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少女怀孕率高,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成为动乱甚至是恐怖活动的根源。2011年伦敦骚乱和2005年巴黎骚乱的原因都是因为生活在多种族聚居区的青少年与警察接触过程中死亡,引发街头暴力和抢劫,参与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嫌犯也同样来自失业率

高达30%以上的移民聚居区。因此,“这些自命为少数种族文化和下等阶层文化等弱势文化保护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在导致处于劣势的少数种族居民和下等阶层居民继续处于劣势方面却难辞其咎。”<sup>[14]</sup>

2005年巴黎骚乱发生之后,欧洲各国就开始反思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治理移民的政策。很多人认为,将贫穷地区与富裕的白人社区隔绝开来是法国移民政策出现的严重错误。德国总理默克尔2010年10月在基督教联盟下属的青年团于波茨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表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在德国和平共处的做法没有取得成果,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sup>[15]</sup>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理萨科奇以及荷兰副首相马古西姆·贵尔巴哈等欧洲多国领导人也相继宣布多元文化的失败。<sup>[16]</sup>

###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若干反思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文化差异,坚持民族平等,鼓励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相比于“熔炉论”等移民治理理论,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在欧洲的实践效果证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仅没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反而造成了文化的区隔,固化了外来族裔的弱势地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外来文化身份的强化,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排外情绪,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尽管这与欧洲各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存在缺陷有关,但多元文化主义本身也有诸多令人反思的东西。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并促进文化的多样性,是对文化同一性的反叛,力图为曾经长期受到排斥破坏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文化提供支持,改变少数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不平等,主张一种多种族共存的文化马赛克或者文化色拉碗模式。多元文化主义相关的政策注重的是单一群体的文化遗产,严格要求群体之内的纯洁性与群体之间的区域性。因此,少数族裔若要获得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承认以及相关的利益,必须加强民族教育,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争取文化认可及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各族裔群体自己的事,外人不能插手,只能袖手旁观。这样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或者个别文化的特殊性,但更容易利用文化来筑起一种屏障,对外以文化为界来区分异己,从而使多元文化只剩下名义上的说法。

首先,这种模式虽然有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

的社会的崇高动机,但事实上却鼓励移民形成一个个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自我封闭的同族聚居区,并鼓励语言上的种族隔离,导致了鼓励种族分离的灾难性后果。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指出,放弃同化、提倡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导致“族性崇拜”被无限放大,从而导致“种族中心主义和分裂主义”。<sup>[17]</sup>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两部著作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那些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sup>[18]</sup>这些右翼学者一般都把多元文化主义视作分裂的种子。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不能消除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和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相信有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自己的价值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体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典型的一神教,是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宗教。这种普遍主义性质是两大宗教长期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之一。<sup>[19]</sup>多元文化主义试图消弭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之间的纷争,但事实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本文化的优越,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立、纯洁和统一,忽略本民族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拒绝与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隔绝政策,导致文化孤立主义,从而形成封闭和排他性格。欧洲主流文化族群以“照顾”的方式居高临下地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往往导致“被照顾者”因屈辱而不满,因弱势而对立,从而导致针对西方主流社会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的发生。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将维持和宽容这种差异作为目的,但这种宽容是以对他者的漠不关心的姿态出现的,是“冷漠的差异”。其结果是只有承认和宽容,而没有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团结,有可能加剧过去体制安排上的不平等,导致不同族裔文化之间的疏离和圣战。正因为如此,也有人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阻止被歧视、被压迫的少数族裔群体反对社会现实中不平等的隐形的种族主义。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林纳和加力·赫尔就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种族主义经过伪装的托词,因为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一个人的种族和民族属性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这就无异于在不同种族之间构筑起不可

跨越的鸿沟,导致民族隔阂固定化。如果说那些公开主张某一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人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那么强调个人种族属性至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则是改头换面的新种族主义者。<sup>[20]</sup>一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后代也认为,“多元文化”认为他们仍然是祖籍国的人,他们的母语是祖籍国的语言,并且应当保持父辈的文化,使他们难以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融入当地的社会,实际上是试图将他们置于肮脏、危险、低贱的工作岗位。<sup>[21]</sup>

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上述特点,很容易被政客们用来方便地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推行有缺陷的多元文化政策,有些国家甚至把多元文化政策作为区隔少数族裔的手段,以最终促使移民的回迁,从而完全背离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实践面临各种更加严重的问题,欧洲各国右翼逐渐抬头,开始出现了各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舆论,欧洲在文化政策上出现了向右转的倾向。从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反对在该国境内新建清真寺宣礼塔,到比利时2010年4月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蔽全身的服饰,再到同年8月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以改善社会治安,多元文化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日渐增多。在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政客们也为了迎合民意,发表否定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论。

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遭遇反映了欧洲人对待外来文化和外来移民的真实态度。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间的必然相遇使文化对话不可避免。极右翼分子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赶出欧洲的想法是荒谬的,不论其采取怎样的恐怖活动,都改变不了世界不同文化接触对话的大势。尽管欧洲各国领导人近年来相继宣布多元文化在欧洲的失败,但绝不能由此转向排斥外来文化,从文化多元主义的倒退只能意味着排斥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实践的失败,其根源在于欧洲各国政府没有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切实解决外来移民问题,只有通过文化宽容走向文化团结,实现文化对话与价值整合,同时从政治经济上采取措施,实现种族平等,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多的机会,才能防止极端分子利用民族感情和文化来从事恐怖活动。欧洲各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走出对欧洲文化的自恋,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样才能克服极端的排外情绪,实现多种族、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实现欧洲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 [注释]

- [1] 张志洲:《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移民问题》[J],《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
- [2] Cited in Layton Henry,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Britai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4, p. 134.
- [3] [英]斯蒂芬·韦尔托韦茨:《欧洲城市的多元文化政策与公民权力模式》[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2期。
- [4] [5]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10页,第218页。
- [6] Paul B. Rich, *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1986, pp. 31-32.
- [7] 方长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8] Cited in Crawford Young, *Ethnic Diversit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155.
- [9] 方长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10] 宋全成:《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 [11] See Melanie Phillips, *Londonistan*,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6.
- [12] See Bat Ye'or, *Euro-Arab Axis*, Cranbury,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3] M. Ali Kettani, *Challenges to the Organizat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therlands: KokPharos Publishing House, 1998, p. 15.
- [14] [美]圣·胡安:《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症结》[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 [15] 《默克尔称德国多元文化努力失败》[N],《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0月18日第8版。
- [16] “萨科奇称多元文化主义失败 卡梅伦推主流价值观”, <http://news.sohu.com/20110218/n279409095.shtml>.
- [17] Jr.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2nd ed.
- [18] [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 [19] 马德普等,《普遍主义与多元文化——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及其关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 [20] Michael S. Berliner and Gary Hull, “Divers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New Racism”, [http://www.aynrand.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objectivism\\_diversity](http://www.aynrand.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objectivism_diversity)
- [21]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作者简介:冯永利,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44);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3-03-06

修改日期:2013-03-28

---

Britain's claim of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Queen Elizabeth Land" in Antarctica has caused controversy. Taking the capacity of effective control of human beings in the Antarctica and its adjacent areas into consid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occupation, Great Britain has not maintained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area of the "Queen Elizabeth Land" and thus cannot acquire the sovereignty over such area on the basis of occu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arctic Treaty, the current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area of "Queen Elizabeth Land" cannot have any effect on the sovereignty over such area. The sovereignty of this area remains unclear. Furthermore, the claim of sovereignty in this area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 of the Antarctic Treaty. Therefore, Great Britain cannot acquire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Queen Elizabeth Land".

**32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 Governance in Europe** *by Feng Yongli & Wang Mingjin*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entering into Europe has increased greatly.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coexist in Europe and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 adopted multi-culturalist policy for the governance of immigrants. Although multi-culturalism declares it respects culture diversity, and advocates equal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sult is not at all satisfactory: Multi-culturalism, instead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causes fragmentation of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t stimulates xenophobia in Europe, and further aggravates the weak social status of the immigrants.

**38 Analysis of U. S. Private Foundations' Democracy Assistance t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by Huo Shuho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 S. private foundations' assistance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countries increased in an explosive way, and gradually formed a path of democracy assistance that include training NGO staff, providing services, programs and fund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fostering civic value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 All these have close support of the U. S. government in the spread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theory that civil society's prosperity is the basis of democracy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globalization's rapid development. Democracy assistance of U. S. private foundations, to some extent, help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ry out the strategy of exporting democrac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ut we can not say that their democracy assistance can consolidate the regio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43 On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tic Council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by Cheng Baozhi*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ocu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Arctic Council need to be followed closely. Since 2009,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the Arctic Council has sped up;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an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of policy-shaping to a somewha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f which the governance func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reas spill incessantly over "soft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energy and shipping, etc. As a non-Arctic State, China shall participate positively in the institutional building of the Arctic Council, and obtain its permanent observer status as soon as possible.

**50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Core Discourses of Three Theoretical Paradigms** *by Shi Jielin & Zhao ha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 structure and units and the factors in system transformation are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by three theoretical paradigms. These interpretations have formed their respective core discourse, which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key variables i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of China'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of analysis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rise and the development